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演变研究

魏海涛¹, 陈 驰¹, 范雨昕¹, 薛 领²

(1.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政策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工具。基于政策系统理论, 构建包含事实与价值的编码框架, 对 149 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文本展开内容定量分析, 从政策系统视角研究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与特征。研究发现: (1)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价值目标由效率为主逐步走向多元化; (2) 能力建设型、系统变革型是主要的政策工具类型, 命令型、激励型工具居次, 劝告型工具使用最少; (3) 政策工具—政策价值匹配呈现阶段稳定性; (4) 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仍是政策工具的主要方向。基于此, 总结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特征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政策系统;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 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5)05-0092-12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WEI Haitao¹, CHEN Chi¹, FAN Yuxin¹, XUE Ling²

(1. School of Govern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erves as a crucial pathwa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with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constituting essential instrument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policy system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ding framework integrating factual and value dimensions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149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y texts, investigating the pathway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a policy system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1)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has evolved from efficiency-oriented priorities to diversified objectives. (2) Capacity-building and systemic reform emerge as predominant policy instrument types, followed by mandatory and incentive-based tools, with advisory instruments being least utilized. (3) The match between policy instruments and policy values demonstrates stage-specific stability. (4) Local government capacity-building remains the primary focus of policy instruments.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roposes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policy system;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content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24-12-30 修回日期: 2025-05-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22AZD043)。

作者简介: 魏海涛(1977—), 男, 山东寿光人,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公共政策。通信作者: 薛领。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政策在促进各地发挥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强调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与整体布局。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我国区域发展正发生深刻调整。政策是政府意志与行为的直接体现,对政策的研究分析往往是一个对政策制定、执行与反馈评估的全方位考察过程。区域政策是一种基本政策^①,这一概念伴随着我国的区域发展不断演化,在其实施主体、目标、空间边界和作用意义等方面,学界逐渐形成了共识^[3-7]。区域协调发展是指不同区域之间比较良性的分工和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比较理想的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提高效率、平衡发展、环境友好3项重点内容^[4]。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涉及主体多,主体间利益关系复杂,且承载了多个方面的社会经济发展任务^[8]。

区域战略与政策是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关键因素^[9]。为促进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已经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制定了多样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学者应用多样化的研究理论与工具,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开展多角度的研究^[10];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11]与演变^[9]、基本内容^[12]、特征以及区域协调

发展历史^[13-14]、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15]、机制与对策^[16-18]、效果评估^[19]等方面皆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政策工具理论有强大的解释力与广泛的应用性^[20],其理论核心在于“如何将政策意图转变管理行为,将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早期有学者使用政策工具理论对欧盟等地区的区域政策进行述评^[21-22]。学界逐步关注到具体的区域政策工具与专业化政策工具建设,如区域政策的属性^[23]、主体功能区^[24]、都市圈建设^[25-26]等。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政策执行研究步入稳中有升的阶段,对政策执行的研究逐渐形成基础性共识^②,主题涵盖区域规划体系^[27]、政策执行理论演变^[28-29]、政策执行案例研究^[30]、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31]等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基于整合视角、多中心治理视角的政策执行研究开始大量涌现。结合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来看,如何把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32-33]是目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要点。

回顾已有文献,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研究更多地是着眼于政策影响因素、政策阶段特征以及政策的效果与路径优化,而缺乏从政策系统视角出发,整体性地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时空演变进行多维量化分析,对相关政策的价值性判断也要进一步挖掘,这就导致区域政策本体研究的完整性、系统性不足。本文基于政策系统分析理论,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涵盖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政策工具、政策价值、政策主体的五维政策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建立编码体系,运用Nvivo软件对我国1978—2021年(截至“十三五”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内容定量分析,系统阐述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五维特征及匹配关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同政策系统理论的交叉融合,揭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结构性、阶段性特征,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

① 基本政策是“在总政策的制约下,解决社会基本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必须坚持的行为规范”。参见魏后凯.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34, 38.

② 见注解①。

策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首先,在研究方向层面,从政策系统的角度,构建时间、空间、政策价值、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的五维系统分析框架,多维度、全过程地定量分析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内容,能有效增强政策分析的系统性和客观性,通过对政策系统动态演化分析,明确了政策执行的基本特征,弥补了传统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研究视角的不足,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打开新的窗口,同时也为政策研究增加了重要的研究对象;其次,研究方法层面,通过对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类型、价值目标、政策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容定量分析,深入到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微观过程,为研究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模式与路径提供量化基础;最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文本的量化处理与结果分析,明确了各个维度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揭示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内在演化规律,指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政策价值等方面调整的重点,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丰富与完善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系统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以及公共政策实施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34],是研究公共政策过程的前提,公共政策是公共政策系统的输出。结合政策系统及政策分析,本文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系统(见图1)。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系统中的各项要素在一定时间段内是相对稳定的,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8],一个政策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引致新的政策问题出现,进而引发政策系统中各要素及其关系的调整,最终导致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系统处于不断的动态演化中。狭义上,其演化可视为系统构成要素,即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工具、政策环境及其关系的演变;广义上,包括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价值导向、理论基础、政策执行方式等内容的演变。本文集中于前者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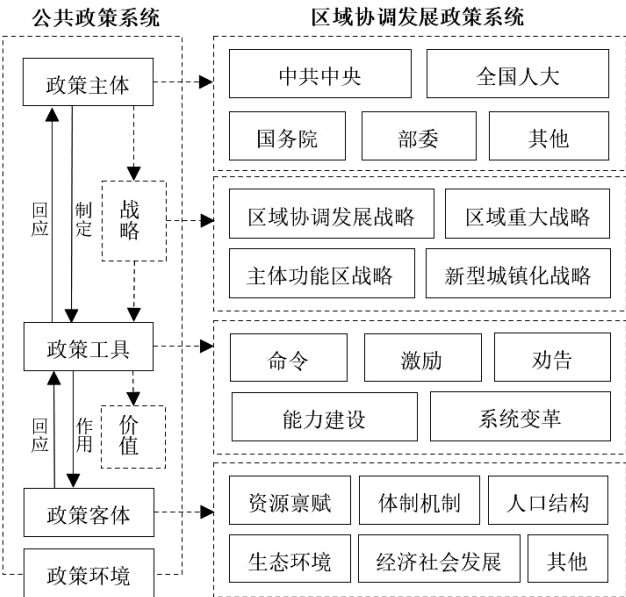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政策系统理论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系统示意

1. 政策主体

政策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组织、团体或个人。本文的政策主体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多部委联合以及部委。通过对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探讨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数量、主体以及主题特征。

2. 政策客体

政策客体是指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系统所关注和影响的问题对象和空间单元,政策客体的不同特点及其需求是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其中,政策问题主要涉及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结构、生态环境、体制机制等领域。基于我国的政策实践,空间单元一般划分为:流域地区,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三大地带,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四大战略板块,即东北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特殊地区,即边远地区、红色地区与民族地区等。

3. 政策工具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是政策主体、客体和环境互动的产物。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仅要界定政策问题,确定政策价值与目标,选择政策方案,还要确定采取何种手段、通过何种机制来执行政策,这种手段与机制就是政策工具,政策工具分析是政策系统研究的核心。政

策工具与政策对象的适配性是影响政策执行过程与效果的重要因素。

结合麦克唐纳与艾莫尔的政策工具类型划分^[35],政策工具被具体分为命令、激励、能力建设、

系统变革与劝告类工具,每种政策工具都包含组成部分、最优运用情境、成本与主要缺点,政策工具在各自适宜的领域内发挥最大作用。各种政策工具的构成、目标与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政策工具分类表

工具类型	主要构成	预计目标	特征
命令工具	规章;条例;法令;行政规则;要求规定	目标群体强制执行政策指令并达成广泛和一致的行为模式	强制要求区域执行某一政策或指令,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激励工具	正向激励和负向惩罚	诱导或鼓励行为主体自发做出预期行为	通过补贴、拨款、优惠贷款等政策工具激励区域积极主动推进协调发展与资源流通
能力建设工具	指导;平台建设;行政能力;人才培养	提高个体、群体、机构能力,为政策执行主体赋能	通过上级指导、平台建设、融资渠道建设等政策提高区域协调发展能力,通过区域内部能力建设与变革提高协调发展效率
系统变革工具	来自官方的权威	赋权或在现有机构中重新分配权威,引发机构、制度变化	通过机构的变革与创新,重新进行权威的分配与机构的调整,层次性明显
劝告工具	号召与宣传;象征与劝导	价值观的引导,促使目标群体践行价值观,具有政府倾向性	通过思想理念的宣传、价值观的引导、核心思想的劝导等引导协调发展,具有自愿性与不稳定性,缺乏约束力

4. 政策价值

政策价值部分参考邓恩^[36]提出的6类评价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分别是效益、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与适宜性。根据研究需要,保留效益、效率、公平,增加生态维度,如表2所示。

表2 政策价值分类表

概念	内涵	关键词
效率	特定政策方案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它是一个量的概念。常用单位成本、净利益、成本收益比来表示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政策与行政效率等
效益	政策产出给社会公众带来正面的、积极的福利的程度,是指政策对质量层面的关注,常用政策及其产出的价值来衡量	区域协调发展各体系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资源配置结构优化等
公平	对区域协调发展中“协调”的内涵的具体阐述,涉及发展能力和发展结果的空间平衡,即成本和利益在空间及其主体间是否平衡分配	区域要素利益平衡共享、区域资源分配能力建设等
生态	生态与环境优化的行为与效果,是结合国情对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政策的重视	区域生态韧性 with 生态文明、生态环境恢复与污染防治等

5. 时间维度

对于政策阶段的划分,参考相关研究,以五年规划(计)划为基本时间单元进行划分^[37]。阶段I(1978—1995年):“八五”计划时期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为非均衡发展阶段;阶段II(1996—2005年):“九五”“十五”区域协调发展的均衡阶段;阶段III(2006—2021年):“十一五”至“十三五”提出了国土空间

格局两大战略^③三大阶段^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同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并行,为全面协调发展阶段。通过纵向的阶段划分,分析政策工具与价值的演化特征。

基于以上政策系统分析,构建主体多元,兼具解释性与操作性的政策五维分析框架(见图2):X维度为政策工具,是政府部门实现政策目标的途径与手段,构建通往政策结果的路径;Y维度为政策价值,主要包括效率、效益、公平与生态4个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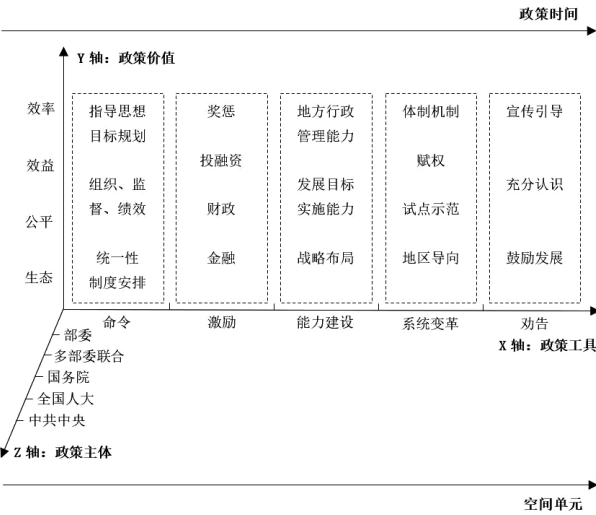


图2 政策系统五维分析框架

③ 指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

④ 第一阶段是到2020年,初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第二阶段是到2025年,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第三阶段是到2035年,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Z 轴为政策主体。政策的时间与空间要素是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自然基础,因此将时间与空间要素也纳入分析框架。

(二) 数据和方法

1. 数据

党的十九大曾指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这反映了国家发展规划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38]。因此,为保证研究的完整性与文本分析的严谨性^[39],本文以 1978—2021 年(截至“十三五”时期)为时间窗口,借助政府官方网站数据与北大法宝数据库,通过搜索“区域协调”“城市群”“都市圈”“长三角”“京津冀”等关键词并进行匹配,收集整理具有区域协调导向性的政策、法规、规划、意见、通知等文件。为保证数据与研究主题的高度相关性,文件摘录规则为:第一,仅选取中央层面及部委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地方级的政策不被纳入样本;第二,仅选取规范性较强的意见、规划、通知、实施方案、法律法规等类型的政策文本,不包括回函、意见征求稿等类型的文件;第三,对政策文本进行人工审查,剔除了仅包含“区域协调”等概括性表述但不包含具体要求或内容的政策文件。经过系统筛选,最终获得有效文本 149 份。

2.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40-42],本文根据政策系统多维分析框架,借助 Nvivo 内容分析软件,以政策语句为分析单元,对 149 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文本进行检索与编码。在编码过程中,由于同一政策中可能涵盖不同内容的政策条文,同一政策条文也可能包含不同的政策工具或价值目标,因此本文的多维分析框架以条文作为最小分析单元,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划分为多个分析单元进行“主轴式”编码,若同一政策条文涉及多个编码目标,则将其拆分为多个子条文分别编码。最后,依据编码结果交叉分析政策价值—工具—主体等的内在关系及匹配性,并对政策在时间维度展开演化分析,阐释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为了评估编码过程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双编

码策略,即由两位研究人员独立开展编码。编码完成后,对两者的编码结果进行检验,在 149 份文件中随机抽取了 74 份进行编码一致性检验,通过计算,两者编码相同的部分占比为 92.16%,编码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二、结果与分析

(一) 政策文本描述统计

在本文收集的 149 份政策文本中,发布于 2008—2021 年的政策文本达到 107 份,占比 71.8%。这一数据显示,较为系统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体系于 2008 年前后初步构建。此后,政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关注度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政策涉及的议题与具体领域存在波动。从政策议题演变看,2008—2018 年以宏观顶层设计为主,集中于城市群、经济带等区域发展规划、规划纲要等的设计与批复,指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目标与方向、组织与实施等;2019 年后议题逐步拓展至城乡融合、乡村振兴、都市圈建设、脱贫攻坚、主体功能区等多元领域,政策重心向更高水平协调发展的具体目标拓展深化。

从发文主体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多部委联合发文分别占据了政策文本总量的 38.35%、27.25%、13.12%,其中联合发文的主体多数包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2018 年以前集中于国务院与国家发展改革委,2019 年以后涉及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部委增多,发文涉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多个领域与议题,如科技、生态、就业、教育、知识产权、基础设施建设等。主体增多、主题多样,政策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领域和项目。

作为核心政策主体,国务院发文集中于发展规划的设计与批复(包括三大地带、四大板块、城市群、生态经济带、知识城等)。就单个部委的发文主题来看,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数量最多,类型多样,涉及意见、规划与发展方案等,内容集中于区域规划、发展规划、合作规划等。联合发文的主题主要涉及需要进行区域或部门合作的议题,如大气污染治理、都市圈、扶贫、市域(郊)铁路建设等公共领域。

其他部委文件侧重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领域,包括财政、环境、科技、交通、工业与信息。

结合我国元政策的政策导向,为 33 份其他部委文件总结了如下关键词:脱贫攻坚、基层服务、交通运输、城乡融合、生态功能区、乡村振兴、就业、治理体系全面深化改革等,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在多个领域的全面布局和深入推进。

(二)政策单维度分析

1. 政策价值类型分析

政策价值统计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价值结构以效率为主,兼顾效益与公平,生态价值相对较少。具体来看,效率占据绝对的价值主导地位,涉及文本数为 136 份,参考点总数 1 367,涵盖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与完善,以及能力建设与提高,通过合理的机制促进能力建设,以能力建设反馈机制的完善。涉及最少为生态价值,文件总数 65 份,参考点数 232,涵盖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韧性、生态环境恢复与污染防治,尤其是区域整体环境保护的区域联动。结合我国政策实践,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政策价值的侧重点聚焦于区域协调基层能力和协调机制的建设,近年来逐步拓展到其他价值维度,且兼顾程度较为均衡(见表 3)。

表 3 政策价值类型统计

政策价值	文件总数	参考点数	编码关键词	文件数	参考点数	占比/%
效率	136	1 367	协调机制构建与完善	126	624	24.3
			能力建设与提高	130	743	28.9
公平	99	456	利益平衡共享、发展结果平衡	60	173	6.74
			要素空间流动、发展能力平衡	84	283	11.02
效益	94	512	结构指向精细化	82	254	9.89
			高质量多元体系	76	258	10.05
生态	65	232	生态环境恢复与污染防治	38	91	3.54
			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韧性	57	141	5.49

2. 政策工具类型分析

政策工具类型统计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结构复杂性高,各类型工具使用频率差异明显。在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中主要采取的政策工具为能力建设型工具,参考点总数 1 115 个,主要包括通过长期性投资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执行能力,如地方行政管理能力(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治理能力)、发展目标的实施能力(空间结构优化调整、区域价值链分工协同、市场机制构建),以及相关基础设施与产业规划等方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对于宏观战略布局,特别是产业体系、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和科技信息网络给予了较高的政策关

注力度(见表 4)。

表 4 政策工具类型统计

政策工具	文件总数	参考总点数	关键词	文件数	参考点数	占比/%
命令型	127	517	指导思想与目标规划	106	247	9.63
			组织、监督与绩效	64	99	3.86
			统一性制度安排	72	171	6.67
激励型	93	230	投融资	35	50	1.95
			奖惩	65	128	4.99
			财政与金融	38	52	2.03
能力建设型	109	1 115	地方行政管理能力	85	346	13.49
			发展目标实施能力	72	249	9.71
			战略布局	94	520	20.28
系统变革型	123	629	新常态	36	59	2.30
			美丽中国	54	126	4.91
			试点示范	35	50	1.95
			地区导向	55	117	4.56
			体制机制	86	277	10.80
劝告型	41	73	宣传引导	29	40	1.56
			充分认识	10	11	0.43
			鼓励发展	15	22	0.86

除此之外,较多采用了系统变革型工具和命令型工具,参考点数分别为 629 和 517。此类政策通过政府直接命令或者由政府将具体权力让渡给新的执行机构的方式,对政策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执行效果。具体到政策内容来看,此类政策往往具备较为明确的指向,如体制机制改革、新常态、美丽中国、地区导向型政策设计,既有一定的延续性、系统性,又有时代指向性。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实践中较少使用激励型和劝告型工具,这可能与激励型工具的效益期限较短和劝告型工具的效能有限有关。

3. 政策区域类型分析

政策区域类型统计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在地域上分配不均,地域分布以三大地带和四大战略板块为主,参考点总数相近,涵盖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与东北振兴,其中对东北与流域地区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涉及最少为流域地区,参考点数 40,而涉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有关流域地区的政策议题指向性强,如美丽中国、生态保护、流域建设、环境发展等政策设计。就空间单元而言,结合政策执行实践,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布局以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为主,兼顾中部与东北地区,同时保障并支持特殊类型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见表 5)。

(三)维度交叉适配性分析

1. 政策工具—政策价值交叉分析

政策工具—政策价值交叉结果显示出高度的离散性,政策价值在五大政策工具类型中呈现出

表 5 政策区域类型统计

空间单元	文件总数	参考总点数	关键词	文件数	参考点数	占比/%
四大战略板块	101	115	东北振兴	15	15	4.37
			东部率先	30	37	10.79
			中部崛起	26	27	7.87
			西部开发	30	36	10.50
三大地带	92	116	东部	34	45	13.12
			中部	28	32	9.33
			西部	30	39	11.37
流域地区	35	40	黄河流域	14	15	4.37
			长江流域	21	25	7.29
特殊地区	64	72	红色地区	14	14	4.08
			边远地区	19	20	5.83
			民族地区	31	38	11.08

较大差异且各有侧重。效率仍是政策工具追求的核心价值,其次是效益和公平,生态最低。不同类型的工具在效率、效益维度配置的差异较大,其次是公平和生态。效率、效益主要依靠能力建设型和命令型工具,其次是系统变革型,激励型再次,劝告型最少。公平主要依靠能力建设和系统变革工具。

作为两大主要的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在不同价值取向差异最大,在效率(42.76%)、效益(30.01%)和公平(25.44%)上应用较多,但在生态(1.76%)方面偏低。系统变革型工具的价值取向差异也很大,效率占比最高(48.73%),其次是生态(20.86%),而公平(16.88%)和效益(13.54%)居于次要位置。命令型政策工具的价值取向差异较大,效率(69.48%)和效益(19.08%)为主,生态(6.62%)和公平(4.82%)偏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价值取向差异较大,以效率(77.27%)为主,公平(13.18%)和效益(6.36%)较低,生态最低(3.18%)。劝告型政策工具以效率(57.53%)为主,生态(16.43%)、效益(8.22%)偏低。

以“效率”为主项,编码量最多的为能力建设型,共 437 条,其次是命令型和系统变革型。就我国政策实践而言,偏好地方行政管理能力提高、目标实施能力、战略布局能力提升等具体方式。命令型、系统变革型使用频次较为均衡,同时辅助运用了激励型和劝告型政策工具,说明政策设计具有系统性、成长性,且带有一定的权威性。

以“公平”为主项,编码量最多的为能力建设型,共 260 条,多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提升区域间市场一体化建设水平,助力实现发展能力

的空间平衡。除此之外,政策工具较多使用系统变革型工具,表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实践在公平这一价值维度关注特定政策概念下权威的变动,通过赋权实现政策执行的良好环境,从而推动利益平衡共享,实现发展结果的空间平衡。

以“效益”为主项,编码量最多的为能力建设型,共 307 条,多关注区域战略合力作用,明确发展目标定位,引导空间结构优化调整和区域价值链的协同。除此以外,效益同样偏好使用命令型工具和系统变革型工具,在劝告和激励方面的政策使用较为匮乏。

以“生态”为主项,编码量最多的为系统变革型,共 131 条,这同效率、效益、公平的工具结构明显不同。就政策实践而言,偏好使用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与深化、试点示范等具体政策工具,表明我国生态价值维度的政策框架处于建设以及转型期,需要通过赋权的方式推进新的政策目标,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同时,生态为主项时,命令型、能力建设型、劝告型、激励型的政策工具使用频次低,生态维度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体系仍有待充实和平衡。

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匹配中,现行的政策工具及其细分条目总体上能够支持政策目标的实现,但仍然存在支持匹配程度欠缺的问题。如效益与生态的政策目标多运用能力建设和系统变革,较少使用劝告型和激励型工具,劝告的引导和激励措施的缺位影响了政策对象的反馈和回应程度;具体到激励型政策工具的政策执行,其缺位主要体现在投融资、转移支付与经济合作上,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偏好指向性政策进行激励,辅以财政与金融调控,对区域间横向激励仍需加强(见表 6)。

表 6 政策工具—政策价值匹配关系

政策工具	政策价值					
	效率	公平	效益	生态	合计	标准差
命令型	346	24	95	33	498	151.00
激励型	170	29	14	7	220	77.20
能力建设型	437	260	307	18	1 022	175.13
系统变革型	306	106	85	131	628	101.10
劝告型	42	13	6	12	73	16.13
合计	1 301	432	507	201	2 441	—
标准差	155.29	103.80	121.78	51.69	—	—

基于以上政策事实的探讨,发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主要集中于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通过官方权威的嵌入和转移实现结构指向的精细化,构建高质量多元体系;通过能力建设工具对中间层级协调的治理能力进行完善,扩大覆盖范围;对区域协调发展价值观的普及、短期价值的创造与激励目标的关注相对较少。

2. 空间单元—政策工具交叉分析

根据表 7,空间单元之间和空间单元内部所涉及的政策工具类型及其使用数量均存在很大差异。四大战略板块、三大地带、流域地区工具类型排序均为能力建设型>命令型>系统变革型>激励型>劝告型,与工具类型总体顺序略有区别,后者为能力建设型>系统变革型>命令型>激励型>劝告型;特殊地区地区工具类型选择为能力建设型>系统变革型>命令型>激励型>劝告型。

以“四大战略板块”为主项,涉及工具类型频次最多的为能力建设型,共 84 条,多关注区域协调中战略合力作用,明确发展目标定位,引导空间结构优化调整和区域价值链的协同。除此以外,四大战略板块同样偏好使用命令型工具和系统变革型工具,但是在激励和劝告方面政策的使用较为匮乏。从工具使用数量上看,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存在一定分化,重点仍是东部率先发展。

以“三大地带”为主项,涉及条目最多的为能力建设型和命令型,分别为 78 条和 74 条,系统变革型工具较多,激励型与劝告型工具偏少。政策工具的系统组合兼顾协调内在效能和权威性,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一体化建设等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关注发展能力的空间平衡。从空间单元的工具使用数量看,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同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时间顺序与积累正相关。

以“流域地区”为主项,协调政策工具类型结构同三大地带工具使用相似。使用工具类型最多的为能力建设型(68 条)和命令型(62 条)。就我

国政策实践而言,偏好地方行政管理能力提高、目标实施能力、战略布局能力等具体方式。系统变革型工具较多,激励型和劝告型工具使用频次少。从空间单元的工具使用数量上看,长江流域要高于黄河流域。

以“特殊地区”为主项,涉及条目最多的为能力建设型(46 条)和系统变革型(38 条),就政策实践而言,偏好使用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与深化、试点示范等具体政策工具。这表明,政策框架处于系统建构期^⑤,兼具内部效能、系统性、自主性、变革性,需要通过赋权的方式推进新的政策目标,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见表 7)。

表 7 空间单元—政策工具匹配关系

空间单元		政策工具					
		激励型	命令型	能力建设型	劝告型	系统变革型	合计
四大战略板块	东北振兴	3	12	8	1	11	35
	东部率先	6	30	41	1	20	98
	西部开发	4	19	18	0	22	63
	中部崛起	4	19	17	1	12	53
三大地带	东部地区	5	35	42	1	22	105
	西部地区	2	18	19	1	21	61
	中部地区	3	21	17	2	12	55
流域地区	黄河流域	3	25	36	0	13	77
	长江流域	4	37	32	1	25	99
特殊地区	边远地区	1	3	11	0	14	29
	红色地区	1	3	7	1	6	18
	民族地区	1	14	28	1	18	62
合计		37	236	276	10	196	755
标准差		1.62	10.97	12.42	0.58	5.77	—

3. 政策价值—政策主体交叉分析

总体来看,政策发文主体的价值取向为效率>效益>公平>生态,且效率居于明显主导地位(见表 8)。在政策价值—政策主体交叉匹配中,发文主体的价值选择结构同总体相近,基本是效率、效益居于相对领先地位,且国务院发文、部委联合发文、部委单独发文超过 50%。综合政策条文及以上分析,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目前仍以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引领性文件为中心,部委联合发文与单独发文分类指导具体实践,部分领域尚需细化政策目标,在未来的政策实践中,需要足够的政策力度支持政策价值在政策执行中体现系统和协同作用(见表 8)。

^⑤ 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对“特殊地区”的定义与划设不断进行增补与完善。参见杨开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基本特征,《中国国情国力》,2016:6-8。

表 8 政策价值—政策主体匹配关系

政策主体	政策价值					
	效率	公平	效益	生态	合计	标准差
中共中央、国务院	76	26	25	4	131	30.57
全国人大	233	102	134	63	532	72.71
国务院	224	61	76	36	397	84.79
国家发展改革委	362	128	170	91	751	120.57
多部委联合	228	48	57	19	352	94.73
部委	182	86	38	16	322	73.71
合计	1 305	451	500	229	2 485	—
标准差	92.25	37.38	57.07	32.98	—	—

4. 政策主体—政策工具交叉分析

在政策主体—政策工具交叉匹配中,不同部委及部委联合发文均体现了对能力建设型工具的高频使用,系统变革型与命令型亦有相当比重,激励型与劝告型占比较少(见表9)。这一特征与前文的政策工具选择结构具有一定相似性。

同时,由于职能差异,政策主体工具选择也存在差别:位于设计顶层的全国人大、国务院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与系统变革型工具,具体内容包括对区域协调发展工作进行指导,对经济带、城市群协同建设等的批复等;各部委依据上位规划,使用能力建设型与系统变革型工具对分管领域进行管理,命令型工具的使用比例明显上升,各类型工具使用数量的差异更小,这与各部委具体指导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执行、规范政策实施流程的职能定位是相符的(见表9)。

表 9 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匹配关系

政策主体	政策工具					合计	标准差
	命令型	激励型	能力建设型	系统变革型	劝告型		
中共中央、国务院	26	28	35	21	1	111	12.87
全国人大	52	43	232	165	24	516	90.73
国务院	79	48	140	120	6	393	54.06
国家发展改革委	148	39	347	151	18	703	130.5
多部委联合	88	34	155	57	7	341	56.94
部委	102	31	93	86	15	327	39.53
合计	495	223	1 002	600	71	2 391	—
标准差	42.04	7.57	109.91	55.70	8.61	—	—

(四)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演变分析

在单维度与二维交叉分析基础上,本文从时间维度对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价值、政策工具类型等方面进行比较归纳,形成对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演变特征的综合分析。

1. 政策价值分析

表 10 显示,各阶段价值取向总体来看为效率>效益>公平>生态,效率一直居于主要位置,且大于 40%,除了在阶段Ⅱ下降到 41.67%,在阶段Ⅰ、阶段Ⅲ

下均在 50% 以上,效益在阶段Ⅱ上升至 32.42%,其余在 22% 左右。公平取向在阶段Ⅱ略有上升,在阶段Ⅲ有较大下降。生态虽维持在最低位,但在阶段Ⅰ、Ⅱ、Ⅲ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见表 10)。

表 10 区域协调发展阶段的政策价值结构

单位: %

政策价值	政策阶段		
	I	II	III
效率	51.79	41.67	53.91
公平	22.07	22.19	16.17
效益	23.90	32.42	20.66
生态	1.47	3.74	9.25

2. 政策工具分析

就区域协调发展各阶段价值—工具匹配变动而言,多以系统变革型工具和能力建设型工具为主。阶段Ⅰ与阶段Ⅱ对于工具的使用结构较为固定,存在部分工具使用缺位现象,阶段Ⅲ的政策价值实现采用了多元化的政策工具。

阶段Ⅰ、阶段Ⅱ政策价值中,效益实现以能力建设型工具为主,系统变革型工具为次,旨在打破发展瓶颈、补齐要素短板,破解综合发展能力的不足与难点;生态实现以系统变革型工具为主,能力建设型为辅,关注于地方事权引导下环境监测网的建设、国土资源与环境的利用与保护等;公平实现以能力建设型工具为主,关注邮电通信、交通运输、经济区网络建设等重点行业的能力提升,完善发展布局;相较于阶段Ⅰ,阶段Ⅱ政策选择更多样,命令型和系统变革型逐步被采用。效率实现以“命令+能力建设”“命令+激励”工具为主,着重强调中央地方事权分配,通过发展目标等政策议题来明确效率的重要性;价值取向的工具选择,劝告型、激励型、命令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

阶段Ⅲ政策价值中,政策工具多元化水平提升,效益实现以能力建设型工具为主、以命令型为辅,逐步打破要素与基础设施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构建资源配置有效、要素流动充分的全国统一市场;生态实现以系统变革型工具为主,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综合利用、集约开发、有偿使用,关注事权下放,推进试点示范建设;效率实现的价值—工具配置发生变化,从以“命令+能力建设”工具为主转向以“能力建设+系统变革”工具为主,与阶段Ⅰ、阶段Ⅱ有所差异,此阶段

效率重点关注战略布局,如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关注内外联通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时较前二阶段对地方协调发展能力的质与量进行了政策引导和加强(见表11)。

总体来看,各阶段中政策价值—工具中的激励、命令、劝告型工具的比例均有一定上升,体现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体系的动态更新与完善。

表 11 发展阶段的政策—工具配置(%)

阶段		系统变革型	能力建设型	激励型	命令型	劝告型
阶段Ⅰ	效益	27.45	44.72	9.76	18.05	0.02
	生态	70.80	28.88	0.15	0.07	0.15
	公平	21.83	54.10	23.84	0.03	0.20
	效率	12.05	38.13	7.30	40.09	2.43
阶段Ⅱ	效益	22.94	74.57	0.82	1.40	0.27
	生态	92.03	7.60	0.18	0.16	0.03
	公平	9.26	73.17	1.53	10.04	5.05
	效率	17.61	20.43	20.87	37.15	3.94
阶段Ⅲ	效益	12.65	58.06	7.61	19.48	2.20
	生态	74.34	6.07	2.71	14.42	2.47
	公平	24.98	56.99	9.68	6.26	2.08
	效率	26.08	36.84	11.82	22.90	2.37

3.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演变分析

阶段Ⅰ:非均衡发展阶段。1978—1995年,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政策理念为非均衡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布局以追求效率为主,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结构特征,即能力建设型工具与命令型工具为主,且能力建设型工具主导。就价值—工具的匹配性而言,该阶段主要采用系统变革型和能力建设型工具。这一阶段政策问题主要表现为生产力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等二元现象显著,因此做出了以空间导向型为主,实行对外开放和三大地带划分的战略决策,这凸显出构建和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系统的迫切需求。此阶段的政策目标为:通过对特定区域实行政策的倾斜与扶持,重点发展部分区域,带动全域发展。

阶段Ⅱ:均衡发展阶段。1996—2005年,这一时期我国面临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地方保护等政策问题。在此背景下,将政策目标设立为地区间关系调整,扩大政策效应,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统筹协调。在此阶段能力建设型工具的使用频率

处于大幅上升期,同时辅以命令型工具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总体调控。在价值—工具的匹配方面,对单一价值采取的政策工具更为激进,有明显的取向偏好,多为能力建设型与系统变革型,符合经济扩张时期的政策需求。效率价值的实现更倾向于使用激励型工具,多为鼓励沿海地区对内陆的支持和促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政策内容与结构均得到进一步完善,强调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但并未进行一体化统筹协调,政策效应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见表12)。

表 12 发展阶段的演变特征

特征	发展阶段		
	I	II	III
政策理念	非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	全面协调
价值取向	效率>效益、公平>生态	效率>效益>公平>生态	效率>效益>公平>生态
政策问题	二元反差现象显著;经济发展总体落后与不平衡	多样化区域局部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地方保护	相对动态平衡;战略性、综合性
政策目标	重点发展部分区域,带动全域发展	地区间关系调整	国土空间格局确立,精细化和可操作化的政策需求
工具设定	能力建设型工具与命令型工具为主,且能力建设型工具主导	能力建设型工具为主导,劝告型使用频率较低,其余逐渐均衡	能力建设型工具为主导,劝告型使用频率较低,其余均衡且使用频次提升

阶段Ⅲ:全面协调发展阶段。2006—2021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同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并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理念转向全面协调,政策体系面临战略协调与综合性问题,表现为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顶层设计需求,以及政策实施的精细化和可操作化需求。就工具类型组合而言,能力建设型工具占比下降,系统变革型工具占比上升,系统变革涉及诸多政策概念,如美丽中国、体制机制建设、新常态等,体现出权威在政策重点上的转移,符合主体功能区与三大空间格局^⑥的建设方向。效率在此阶段占比上升。就价值—工具匹配性而言,该阶段政策工具配置更趋均衡,统筹协调了央地权责关系、政策权威转移、地方激励等诸多维度。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的政策文本数量增长和结构优化同步推

⑥ 三大空间格局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

进,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价值取向与政策工具选择渐趋成熟与稳定。

三、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一) 研究结论

纵观改革开放 40 余年,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历经从计划到市场再到复合化、系统化的结构化变革,并逐步上升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

首先,我国区域空间广大,问题多样,政策制定与执行兼具阶段性和针对性,且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强,对实现阶段目标有重要意义。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历经非均衡发展 and 均衡发展阶段,进而实现全面协调的过程,在一系列变动中,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价值与二者匹配体系存在结构上的阶段稳定性,不同阶段之间的工具—价值匹配存在相对差异,依据政策问题而不断完善其针对性和协调性。总体而言,对命令型工具依赖减弱,能力建设型工具为主导,劝告型使用频率较低,其余使用较为均衡,且使用结构逐步完善,价值以效率为主,兼顾效益,注重公平,对生态维度的关注逐步提升。

其次,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展现出较强的导向性与权威性,其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需要的导向性始终不变。全国人大与国务院在政策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具体领域中与相关部委协同制定、执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政府权威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方向与态势,其发展理念的改变也决定了政策执行的过程与效果。与权威导向性相呼应,我国始终注重政策实施的效率与效益,这一特征使得经济活力实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助推了经济发展和协调进程。

再其次,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层级性明显。前者表现为政策的行政技术管理过程;后者表现为制定与执行的分离,由上而下层层执行的过程明显,我国历次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执行呈现出对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落实落细的特征。政策执行效果依赖于主体、政策工具、执行督查机制等要素之间的互动结构及其组合方式的优化,从政策过程的视角看,政策执行过程尚未形成闭环,缺乏执行过程与政策效果的系统评估与监督,影响或阻碍了政策学习、政策调整的选择与进程。

最后,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中,能力建设型工具在较长时间内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说明我国高度注重区域发展动力源、动力区(如城市带、经济带等)与配套的经济体系建设,健全和发展区域内生动力为主的政策作用方式。在此过程中,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对象单元实现了从单类型大尺度到多类型多尺度的转变。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共同体尚未完善,存在制定与执行的局部分离。现行政策主要是由中央政府牵头,通过命令性措施来推行宏观体制机制的建立完善,而地方及微观主体的回应性有待加强。随着区域协调发展进程的推进,亟需激发区域微观主体的能动性,将区域协调发展对顶层设计的依赖过渡到遵循顶层设计进行区域间协调,重视政策设计与实施,健全上级嵌入地方政府间协作的机制,充分发挥上下联动效应。

(二) 进一步研究方向

未来,从政策主体与执行的角度看,需要在明确不同层次、不同尺度区域功能定位的基础上,理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关系,研究明确区域协调发展的门槛、标准、类型与特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共同体建设,因地制宜建立中央和地方战略实施联动机制,提升政策执行的回应性、适应性与协同性;从政策过程的角度看,应进一步研究区域协调发展进程和特点,完善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与政策价值的匹配体系,优化选择政策工具组合,细化空间单元,推进多层次、多类型、多尺度、多目标区域战略的衔接融合,减少政策混合效应,提高精准性和系统性,充分发挥政策叠加效应;从政策评估与学习的角度看,仍需研究优化政策设计与执行框架,进一步完善政策评估机制。

参考文献:

- [1] 魏后凯.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实现高质量、全面、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J]. 国家治理, 2024(16): 3-4.
- [2] 沈体雁, 揭阳扬, 肖金成.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 50 人论坛”第 23 次专题研讨会综述[J]. 经济研究参考, 2023(6): 20-28.
- [3] 张可云. 区域经济政策: 理论基础与欧盟国家实践[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1: 16-18.
- [4] 杨龙. 中国区域政策研究的切入点[J]. 南开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4(2):88-102.

[5]张军扩. 中国区域政策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 2022(11):1-11.

[6]蔡之兵. 从区域战略到区域政策: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方向与思路[J]. 学术研究,2023(9):104-110.

[7]魏后凯.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抉择与政策重构[J]. 技术经济,2023,42(1):14-24.

[8]范恒山.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涉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关系[J]. 全球化,2024(4):11-21,133.

[9]安树伟,李瑞鹏. 东西差距还是南北差距: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差距的演变与机理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23(4):109-120.

[10]孙亚男,刘燕伟,傅念豪,等. 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模式、区域差异与协调发展[J]. 财经研究,2024,50(6):1-17.

[11]孙久文,王邹,蒋治.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区域协调发展[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3):1-10.

[12]董雪兵.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J]. 经济研究参考,2023(6):17-19.

[13]付晓东. 70年来我国区域政策演变历程与未来趋势[J]. 国家治理,2019(21):26-40.

[14]夏添,夏迎,刘晓宇,等.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政策体系演化:基于动力视角的三维分析框架[J]. 地理学报, 2023,78(8):1904-1919.

[15]于文豪. 区域协调发展合作机制的内部规则[J]. 法学杂志,2022,43(3):57-70.

[16]孙久文. 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3):64-67.

[17]张翱,孙久文.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J]. 区域经济评论,2023(1):36-42.

[18]王业强,魏后凯. “十三五”时期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与应对[J]. 中国软科学,2015(5):83-91.

[19]杨永芳,王秦. 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4(增刊1):182-190.

[20]陈振明,薛澜.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140-152,206.

[21]夏英杰,齐兵. 欧盟区域政策工具分析[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23):92-93.

[22]杨逢珉. 欧盟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2009(8):74-79,89.

[23]邓睦军,龚勤林. 中国区域政策的空间属性与重构路径[J]. 中国软科学,2018(4):74-85.

[24]孙久文,蒋治. 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骨架与路径构想[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26(4):78-87.

[25]孙久文,史文杰.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J]. 中国国情国力,2023(5):4-11.

[26]杨开忠. 增强区域经济互补性与融合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J]. 中国国情国力,2024(8):1.

[27]张满银. 中国特色区域规划体系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0(5):72-84.

[28]吕志奎. 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J]. 太平洋学报,2006(5):7-16.

[29]丁煌,杨代福. 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研究途径与模型建构[J]. 行政论坛,2009,16(3):21-26.

[30]王阳. 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交锋与制衡[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31(6):108-112.

[31]吴宾,齐昕. 政策执行研究的中国图景及演化路径[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8(4):33-46.

[32]马正立. 公共政策执行系统的四个基本逻辑[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3):67-78.

[33]陈振明. 中国特色制度执行理论的构建:制度执行力的一个研究方案[J]. 行政论坛,2024,31(4):5-14.

[34]石培华,翟燕霞.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旅游企业复工复产政策差异及协同研究:基于122份政策文本的计量探索[J]. 经济与管理,2021,35(4):74-83.

[35]福勒. 教育政策学导论[M]. 2版. 许庆豫,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230-235.

[36]邓恩.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7-90.

[37]刘秉镰,李国平,等. 构建新发展格局共谋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展望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七周年高端论坛专家发言摘编[J]. 经济与管理,2021,35(3):23-30.

[38]胡鞍钢,唐啸,鄢一龙. 中国发展规划体系:发展现状与改革创新[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8(3):7-14.

[39]王海成,张伟豪,夏紫莹. 产业规模偏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省级政府五年规划文本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23,58(5):153-171.

[40]SHAPIRO G, MARKOFF J. A matter of definition[C]// ROBERTS C W.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Mahwah: Lawrence Erlbaum,1997:12.

[41]魏海涛,魏振明. 基于政策文本的京津冀创新系统协同性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23,30(11):91-99.

[42]魏海涛,解诗琪,张旭亮,等. 长三角区域创新政策系统协同发展研究:基于文本计量方法[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31(8):9-18.

(本文责编:润泽)